

冯玉祥、蒋介石柳卫车站会晤

刘 式 武

民国16年春（1927年），冯玉祥将军率部驻浚县之道口镇北辛店时，蒋介石特约冯将军会谈，地址选定道清铁路之柳卫车站。届期，蒋介石乘钢甲车经新乡开赴柳卫车站，冯将军亦乘车前往会晤。会谈后，冯、蒋二人于柳卫车站摄影留念。此照片刊于《冯总司令最近之言论》卷首，我于1928年曾获得一册，珍藏至1938年日寇涂炭浚城及汤阴匪徒抢劫浚城财物时，我珍藏之珍贵书籍及有关历史文物资料、图片等均被焚劫一空，蒋、冯会晤柳卫车站之照片，亦无从寻找。余今概略其事，虽系蛛丝马迹，然可抛砖引玉，引启史学家及知情者挖掘、探讨、研究其内情。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浚县政府情况

概 述

刘 式 武

1938年3月29日（民国二十七年农历二月二十八日），日寇侵犯浚县，县城再次沦陷。日寇在县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集体大屠杀惨案，许多城镇居民惨遭杀害。日寇撤离县境后，城内又遭到“二土掇”的抢劫，更使城镇秩序混乱，人心惶惶。

不久，汤阴县惯匪郑和等匪徒又窜入浚县城内，以维持秩序为名，明征暗抢，并不时的窜至县城附近村庄大肆掠夺，城乡居民多被抢劫一空，连小孩子的衣着也被掠去。匪徒白日在县城内外强行摊派粮款，敲诈勒索；入夜则分股到处作案，胡作非为。土匪有他们自己的规定和惯例：凡掠夺的财物统归他们集体所有，而凡匪徒穿在身上的衣物，则归个人所有。

一时匪徒们外罩一件形形色色的外衣，内套多件妇女的红绿花衣。匪徒一日三餐，全由城内居民轮流摊派，并规定早、晚米饭必须是插入筷子不倒（饭稀易倒，饭稠才能不倒），方算合格，否则，必须另行再做。匪徒如稍不满意，轻则责骂，重则毒打。城乡居民终日提心吊胆，缺衣少食，濒于死亡线上。

是年4月，县长马廷松由国民党地方武装扈全禄部护送进入县城，驱走汤阴匪徒，整顿旧衙，恢复机构，开始推行政令，组织“抗日义勇壮丁队”，并在县城开办第一、第二临时小学校，城内秩序渐趋稳定。

8月，马廷松因时局多变，为安全计而撤离县城，驻县北沙地村一带。不久，日寇袭击沙地村时，马廷松逃离县境，他所组织起来的武装亦因之解体。

1939年，继任县长李庆曦来浚，保安团长蓝灿然也随之入境，此时县政府设在屯子一带。因屯子镇久为日寇觊觎南犯要道，李畏其不测，1940年春，将县长职务交保安团长蓝灿

然暂行代理，自己于某日夜晚潜逃。蓝灿然不久也相继离境。

1941年春，国民党系冀鲁豫边区总指挥龚伯龄委派部属职员余文华为浚县县长。余与扈全禄取得联系，得以偏居汤阴县西南太行山丘陵地的南山村（现划归鹤壁市郊区），召集部分旧县府职员，组成县政府。县府除照例办理日常公文外，经常派出催征人员，赴县境西部地区催征粮款，维持开支。是年秋，上级拨付赈款，救济灾民，余文华委派书记处书记长武士印赴三角村一带捏报赈册，仅将部分赈款交付县西六、七、八区区长代发，结果又为区政人员中饱私囊。

1942年12月，余文华被撤职，县长由国民党专员杜淑（1943年后任伪新六军军长）兼任。杜将县政府由汤阴县西南南山村迁入浚县境内西南部前草店村。当时县政府设有秘书、一科、二科和书记处等，县教育局、县党部设于张屯村，开始筹办以乡镇为中心的学校。

1943年农历正月下旬，日寇向草店一带骚

扰，杜淑连夜率部开赴东明县，县府人员除部分外籍人士随军奔走外，其余浚籍人员则疏散回家。

1943年3月，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委任盛葆光为浚县县长。盛既无枪支人马，亦未与地方会团接触，入境执政，确非易事。后与滑县以联保主任起家而逐渐拥有雄厚实力的王泰功及地方会团柴湘亭联系，附依其势，才得以在县南丁堤口一带活动。后来，盛为便于在县境北部开展活动，又与县东北大土匪孙步月取得联系，在孙步月盘踞的黄辛庄（当时属滑县）组织起县政府，召集部分旧政府职员开始办公。县保安团也逐步建立起来。不久，日寇围击黄辛庄，盛葆光等人逃脱。

是年夏，盛葆光又与县西扈全禄磋商，将县政府设在县西边陲太行山区之王洞村（淇县境），此时县府设秘书二人，科长二人，办事员及书记处人员六人，由扈全禄派一大队武装保护。盛葆光则深入县境北部与地方会团频繁接触，磋商如何打开工作局面。

5月中旬，日寇增兵汤阴县之宜沟镇，侵犯太行山区朱家村、贺家村一带，县政府机构又为日军骚扰而解体。由于盛葆光在县北利用亲朋故交关系频繁活动，逐渐取得地方会团及士绅的支持，得以在县北部组织县政府，恢复机构，充实人员，发展武装，扩充实力。自此至1945年5月，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县府在县北一带又几经迁移，朝夕不定。先后在下高村、沙地、枣林、乔庄、窑头、韩寨府、孙庄、付庄等处办公，处理公文，征派粮款，并利用淇县境内之中统电台（台长宋锡儒）收发电文，与上级联系。此期，盛葆光为扩大势力，发展武装，曾委派各区区长，如二区区长张云、六区区长周鸣岐、七区区长郭芳春、八区区长高树华、九区区长李杰三等，采取提取、摊派、购置等方法扩充枪支，建立起县长卫士班、特务队，增强了武装力量。政权所及达六、七、九区全部地区，一、二、八区部分地区，五区少数村庄，派款征粮诸事宜得以顺利进行。为适应政府住地之变迁，工作人

员之来往,便于取得联系,县府还于县北桑村庙集市上开设小型杂货铺一处,作为秘密联系点,由县长的表兄刘鸿犹及县长之弟盛葆礼负责,并承办粮款征收、拨付等事宜。1945年5月初,开始不定期的印发小型《战报》,宣传中央社发布的国际战况,9月印发法西斯德国投降与日寇失败的消息,发布各区,并秘密送进日伪警察局及其他日伪单位。日伪人员亦多方与国民党党政机关频繁接触,寻找后路。如新民会翻译官朱汉杰与国民党浚县执委会书记长王泰峰会面、日伪警察局长赵伯贞派人把王泰峰接至私宅交谈、伪县府科长刘竹斋等人与盛葆光联系等。

1945年6月,县政府由县北付庄迁至县城西南李庄,不久又北迁至长村。国民党浚县执委会亦同时设办公地址于东长村——李庄。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伪人员不时的前往长村与国民党县府官员会晤,商谈交接事宜。日伪县政府的一切财物、档案暂由伪县府科长刘竹斋及日伪警察局督察长朱××负

责管理，等待国民党县府入城接管。

8月17日夜11时，盛葆光率县府人马由刘竹斋率领伪一区人员从南门迎入城内。20日，特务队受命抢扒卫河河堤（西关南边旧涵洞），企图放水淹没县城城南一带，藉以加强防卫，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县城。23日下午，共产党人民武装进驻长村，夜间围攻县城，盛葆光率部潜逃淇县、汲县。

附：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浚县政府情况

1945年9月下旬，盛葆光又复入县境平汉铁路西南之刘庄组建县府机构，征派粮款。

1946年春，河南省救济总署拨发给浚县部分面粉、衣服，赈济灾民，县府捏报赈册，于刘庄发放，救济物资多为权势人员冒领。7月初，浚县国民兵团机构成立，司法独立，改设司法科。农历十月初，县府迁移到卫贤集，不久借助国民党85军势力率“还乡团”进入县城，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残酷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民兵、农会会员、进步人士及其家属，如北大街郭老澄等被惨杀。保安团副

张德宽、三青团主任曹祖晋等人乘机报复，大泄私愤，暗杀无辜，不可胜数。如西关聂姓全家被害投河。盛葆光则利用职权，由表兄刘鸿猷负责，强令附近村民为其重建院宅前厅后楼，大肆敲诈勒索群众的财物、粮食。

县府入城后，扩大了工作机构，增设了社会科、军事科、合作办公室、会计室等。12月间，浚县无线电台成立，吴光甫为台长。

1947年8月盛葆光去职，继由张雄潮接任县长。4月中旬，火龙岗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军队惨败南逃，浚县县城二次解放，国民党县府官员及顽杂势力随之逃窜至汲县城，驻卫滨中学。秋天，于浚县淇门镇设行署，代行政府职权。1948年11月，张雄潮调走，张澍云接任。12月，共产党太行部队再次围歼浚、汲、淇三县顽杂，解放淇门，行署灭亡。接着解放汲县，张澍云逃往新乡。

1949年春，新乡解放，张澍云被俘，国民党浚县政府至此结束。

扈全禄杀人一例

任思义

1938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凌晨，人们还在睡梦中，浚县新镇乡李桥村就被浚县大土匪扈全禄率部包围了。我的父亲听到枪声便急忙起床。这时突然有人砸门，并大声诈呼。父亲胆颤心惊的把门打开，立时便闯进来五、六个土匪。他们二话没说，一拥进了里间，一看墙上挂着一支步枪，便抢了过去。一个土匪对我父亲说“借借你的枪，打败了日本鬼子就还你”。我父亲不敢不依。可是他们“借”了枪，还要子弹。已经全给他们了，还是不行。他们翻箱倒柜闹腾了好一阵子，也没找到什么，却把几件首饰拿走了。

吃过早饭，只听保长敲着锣满街吆喝叫去火神庙前开会。那年我才11岁，也随母亲去开会了。到那里一看，只见桥南边的树上绑着三

个人：一个是刘老一，一个是代老贯，一个是任尚义。场上放着一口铡，铡口里躺着一个人，已经被铡掉了头，后来才知道那是全村最老实的代清兰。这时只见一个矮个子的人满脸杀气，狞笑着朝刘老一走过来，他后边还跟着几个护兵和保甲长及大户家十几个人。听大人们说，那个矮个子叫扈全禄，是个“司令”。只见他走到刘老一跟前“嘿、嘿”了两声说：“你杀了我的朋友王成斌，今天我要拿你活祭！”说罢，他把头一摆，随时就有一个人拿着一把宝剑朝刘老一的脸上一戳，先割掉了老一的鼻子，接着又把两个耳朵割下来，再割断颈筋，又在两个膀尖上割了一圈，又将两个膀骨割断，最后在两肋上戳了两刀，才算结束。据说，这就叫“大卸八块”。

原来那土匪头子王成斌（高寺南人）是被刘老一的哥哥杀死的。杀死后得了两支枪，给了老一一支。据说这只枪曾在任尚义家存放过，故而任尚义也遭了殃。

代清兰是因为套磨借了代老贯一头牛，有

人向扈诬告说那头牛是劫人家的，而代清兰坚决证明是买的。所以扈全禄就听信诬告人的话将代清兰铡死了。幸亏保甲长和大户们磕头、求情、担保，代老贯和任尚义才幸免于难。

这次李桥村所有的枪支，全被扈匪“掐”走了，还杀了两个人。十二日扈匪又包围了卫贤乡赵岗村，铡死了崔、刘两姓30多口，景况之惨，目不忍睹。

焦作中福公司道口煤炭经理处 总经理陈璐宪贪污巨款案记述

刘 佩 甫

民国26年（1937年），我在浚县教育局当办事员。浚县教育界联合各机关团体及地方知名人士在县长余芸澍的支持下，联名揭发“焦作中福公司道口煤炭经理处”总经理陈璐宪贪污巨款年达10万余元一案。此案轰动一时。当时一切揭发文件，由教育局长刘式皓主笔，我经手誊写，故对此事知之较详，特回忆如下：

浚县道口镇（今划归滑县）为豫北重镇。清末至民国年间，卫河水中帆樯如林，陆路交通南来北往，且道清铁路通新（乡）达清（化），街市繁荣，商业发达，素有“小天津”之称。

“焦作中福公司”在道口镇设立“煤炭经理处”（以下简称道口经理处），大量煤炭源源运至道口，供应浚县以东滑县、濮阳、东明、

长垣、清丰、南乐、内黄等地广大城乡用户，畅销量年近30万吨。道口镇私人经营煤栈业者有17处之多（指载煤车、船直接甩到或停泊场地的大煤栈）。

由焦作运至道口之煤，归“道口经理处”统一调配，批给各煤栈销售，因此，总经理一职，权莫大焉。当时经销情况，全是资本主义方式。煤栈多系私人集股，商业竞争激烈。在煤炭供不应求的季节里，各煤栈要争做生意，就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谁能向总经理行贿送礼，不交煤炭价款，也能先批给煤，火车可直接把煤甩到栈里，待煤卖出后，钱赚到手，再交煤款；否则，即便先将煤款交付，总经理亦延不发煤，你只好瞪着眼睛看着别人卖煤赚钱，自己闲着无煤可卖，无钱可赚。商人也是有贫有富的，做生意是他们的终身职业。部分穷苦煤商甚至是借贷的资本，由于无煤可卖，不但不能赚钱，还须按月交付利息，加上苛捐杂税、栈里开支，有的竟赔累不堪。同是煤商，有赔有赚，有哭有笑。总经理可是大发横财了。此

款何来？水涨船高，煤上加价，苦害了广大的消费者，当权者从中刮取了民脂民膏。

1927年，冯玉祥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进驻新乡，闻知此事，曾将当时“道口经理处”总经理胡昂九“邀请”到新乡，命胡昂九将贪污之款给士兵们发饷，胡不从，结果退出部分赃款后，被枪毙于新乡。一时人心大快，打倒一个典型的“贪官污吏”。

后来“道口经理处”总经理换成陈璐宪。其叔父陈汝珍是河南省河务局长，官高爵显，为侄儿谋得总经理之职，是上等肥缺。陈璐宪到任后，因冯玉祥离开了河南，无所顾忌，较胡昂九更为贪婪。道口煤栈有“盛盛公”等17家，他们为了不用资本多卖煤、多赚钱，纷纷向总经理请客、送礼，以至形成行贿大比赛、大投标。你敢花一百，我就敢花二百，你能送八百，我就能送一千，争向总经理献殷勤。反正总经理眼睛不瞎，心里有数，送礼花钱，很起作用，不能让商人们白花。陈璐宪不怕这样干，送礼越多越好，谁送的多，就

给谁先批煤，多批煤。这样一来，各煤栈赚钱赶不上送礼的速度了。小经理们慢慢的觉醒过来，有人提议：“咱们都是生意人，有生意大家做，有利益大家沾，大家都要吃饭，不要再闹了，长此下去，咱们都要关门了”。但是，经过讨论，一致认为不送礼是不行的。便议定每吨煤提出四角钱（当时叫作“四毛捐”）给总经理，按此数目，谁卖多少煤，谁就提出多少“四毛捐”，统一起来，来了煤依次序平均调配。陈璐宪一算帐，这样每年可以坐享10多万元入私囊，于是便同意了这个办法。

说到揭发陈璐宪的贪污，就必须谈一谈浚县教育。当时浚县教育经费的来源，除省令批准按田赋每两丁银附加四角外，有学田、庙产、船捐、牲畜捐等等，全年预算收入5万余元，因之浚县教育局被列为一等局（当时省规定各县教育经费全年在5万元以上者为一等局，4万元以上不满5元者为二等局，3万元以上不满4万元者为三等局）。然而全县当时中等学校仅有一所（先是师范讲习科，附设于县

立第一小学校内,后来成立了师范学校,继又改为简易乡村师范。待师资敷用,改为初中);小学教育有县立完小14处,县立初小6处;其余全是村办,倡办保学,每保1处初小,全县约400处;社会教育有民众教育馆1处,图书馆1处,阅报栏6个。当时的教育是相当落后的,虽然按教育经费来说,属于一等局,年达5万元,但还不及陈璐宪贪污款的一半。

浚县教育界的人士,本来是不敢同名震一时的陈汝珍叔侄较量的。开始是婉言向陈璐宪晓以大义,劝其捐资兴学,希望他在道口镇开办中学一所,每年经费不过万余元,既培育了浚县的莘莘学子,又可为其本人扬名后世。也就是说,以敲来的人民骨髓,办一点有利于人民的好事,尚可将功弥罪于万一。詎料陈璐宪善财难舍,不但不肯,反说浚县教界人士无事生非,勒索敲诈,并且坚决不承认有“四毛捐”之事。其实,当时教界人士并无很大的奢望,如果陈璐宪能拿出一两万元,资助浚县教育经费,也就草草收兵了。不意,事情弄成僵局。